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杨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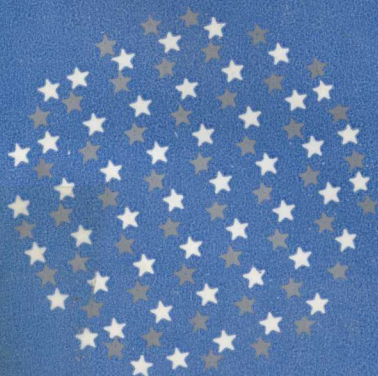
杨洪杰 主编

王贵福

HEILONGJIANGJAOYU

CHUBANSHE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杨唯真 杨洪杰 王贵福 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0年·哈尔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杨唯真 杨洪杰 王贵福 主编

责任编辑：张希玉

封面设计：张琳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九站街1号）
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375·字数170千

1990年7月第1版·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16-1234-8/G·894 定价：3.80元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使思想政治工作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为坚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一代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政工干部，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取得了宝贵的经验。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为学校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为稳定学校局势和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十年来，一直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从而使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并造成严重失误。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国际敌对势力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到今天，他们一天也没有放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企图。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手段，把西方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来。高等学校则是他们实施这种反动战略的主要对象和阵地。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虽然不是主要矛盾，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战略相呼应，极力鼓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赵紫阳同志提出“淡化”党的领导，“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纵容和支持态度，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猖獗地泛滥起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使争夺教育阵地，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出现了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状况，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这些年来，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尖锐对立和斗争，我们感到，在高等学校主要反映在如下一些根本问题上：要不要坚持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要不要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德育放在首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不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要不要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继承和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要不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以专职为骨干专兼结合的政工队伍，等等。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坚持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由于前面提到的客观上的、领导上的以及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种种原因，因而高等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被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软弱涣散状态，从而造成一些学生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品德行为发生严重扭曲和混乱。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这些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国内外势力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再次拨正了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正确航向。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

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经过反思，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变化之快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是大有希望的，当代的大学生同样是大有希望的。

历史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宝贵的。上述内容正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十年的回顾与反思》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本书是辽宁省高教所、吉林省高教所、黑龙江省教科所协作编写的第二本书。1989年7月在黑龙江省召开的东北三省高教所第三次协作会上，确定了编写这本书的课题。本书原计划于1990年3、4月间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延误了时间。参加撰写的有辽、吉两省高教所和黑龙江省教科所及黑龙江大学高教所的同志，具体执笔人是：杨洪杰（第一章），于信凤（第二章），王华春（第三章），王松、胡志伟、于青（第四章），王庆玲、韩树华、冯劲松（第五章），张艳、薛德文（第六章），赵滨、王燕泥（第七章），王贵福、张华（第八章），韩树华（第九章）。全书由杨唯真、杨洪杰、王贵福组织和统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导，紧密结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并参阅了有关专著，特别是近一年来的有关论文和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特别是主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一定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甚至错误之处，我们恳请广大读者与同行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7月于哈尔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十年来学潮的反复到五十天的风波	(1)
第二节 党中央为新时期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11)
第三节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 和新的转机	(21)
第二章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时期和 新环境	(28)
第一节 历史新时期的新任务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新环境	(29)
第二节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 课题	(35)
第三节 创造良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 环境	(40)
第四节 思想政治工作的继承和创新	(44)
第三章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情况的基本特点	(49)
第一节 社会存在决定大学生思想的基本 特点	(49)
第二节 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大学生的心态 和动因	(55)
第三节 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基本 估计	(62)
第四章 坚持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方向	(66)

第一节	正确发挥社会主义大学的职能·····	(66)
第二节	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培养 目标的首位·····	(75)
第三节	要重视争夺青年斗争的新特点·····	(84)
第五章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94)
第一节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依据·····	(94)
第二节	确定培养目标的思想品德结构·····	(104)
第三节	明确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 内容·····	(110)
第六章	总结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途经和方法·····	(118)
第一节	加强和改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 教学·····	(118)
第二节	充分发挥教书育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作用·····	(127)
第三节	切实加强社会实践教育·····	(134)
第四节	加强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和 引导·····	(144)
第七章	切实加强专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154)
第一节	专职学生政工队伍受到的冲击及造成的 严重影响·····	(155)
第二节	充分认识专职学生政工队伍的地位和 作用·····	(158)
第三节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学生专职政工 队伍建设·····	(164)
第八章	重视校风建设和学校管理在育人中的作用·····	(174)
第一节	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174)
第二节	要十分重视校风建设·····	(182)

第三节	加强学生管理，从严治校·····	(189)
第九章	加强党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200)
第一节	我国学校体制的特殊性·····	(200)
第二节	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	(209)
第三节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论研究·····	(214)

第一章 绪 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各项改革深入展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十年来，学潮反反复复，越演越烈，最后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果断决策，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使中华民族避免了一场历史性的倒退。风波过后，人们对此表示震惊、迷惑，就是许多大学生也感到愕然，有的还为自己的初衷进行辩解，感到委屈。但是，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因此，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摆在办学的首位，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一代代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回顾十年来学潮的反复和大学生们的思想变化轨迹及反思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对端正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节 十年来学潮的反复

到五十天的风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标志着给党和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的结束。1977年，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

的高考制度，几百万长期忍受知识饥渴的知识青年，呼拥着走进考场，参加几十比一的空前激烈的较量。1978年初，几十万胜利者怀着求知的热望和迎接新时代的激情跨进了高等学府。“把损失的青春夺回来”，成为新一代大学生的共同心愿。尽管当时全民族的思维还被“两个凡是”严重地束缚着，但作为变革时代最活跃因子的大学生，他们的思想已率先于其他社会群体开始涌动。这种涌动同中国社会变革的曲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及其矛盾冲突联系在一起。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使亿万群众沉浸于“第二次解放”的亢奋之中，同时又陷入对历史特别对“文革”的深沉的反思，造成“十年灾难”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强盛之路？由于人们的经历、实践经验和理论素质的差异，这种反思是沿着成熟与幼稚、理智与盲目甚至是偏执两种不同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往往得出貌似一致，实质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结论。

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利用我们党否定“文革”，纠正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机会，鼓吹要“彻底批判共产党”，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大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相继出现，北京的“西单墙”成为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集中的场所和阵地。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复杂矛盾中，在思想理论战线各种思潮突起的时候，一些被激情驾驭的大学生难

以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表现出幼稚和盲动，以及对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浅薄。他们或组织“研讨会”、“辩论会”，或效法“西单墙”，慷慨陈词，各抒己见。他们对国家过去和现实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痛苦而激烈的反思，对“个人迷信”、“阶级斗争为纲”等表示出深恶痛绝；同时不少人也使自己的思维方式陷入误区，对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问题产生困惑和疑虑；一部分学生头脑中萌发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和“信心危机”。如果允许“西单墙”这种自由化的“街头民主”任其发展，无疑将会把国家再次引向新的动乱，因而被党和政府理所当然地取缔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在继续批判“左”的错误的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批判了社会上和党内出现的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某些人（哪怕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这个讲话向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敲了警钟，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正确方向。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些人甚至还存有许多“不理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以及它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也没能引起全社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的高度重视。

时隔不久，国内一些大学中出现了大学生“竞选”的风潮。这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大学生影响及部分大学生发生“三信危机”的反映。在少数大学生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改革的成功、弊端的铲除，非有大学生的参与不可。他们

企图通过自己的参与，推进他们臆想中的改革进程，个别人凭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肤浅了解，极力赞扬“议会民主”、“多党轮流执政”，甚至把“我不是共产党员”也当作参加“竞选”的条件。可见，他们尝试参与社会的第一步，就表现出思想轨迹的偏邪和行为的浮躁。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的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文，立即在一些大学生中引起了共鸣。这一年，“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萨特病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萨特热”。他的“存在主义”，以及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等著作，相继被译成汉语出版。这些以“唯我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应运而生的“自我设计、自我成才”的“人才学”，在大学校园里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处于失落状态的大学生的精神寄托。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成为大学生争论的热门话题，从而在大学生中鼓荡起自我追求、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激情。一些学生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和“英雄是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是自己成为懦夫”当作人生哲学的格言。他们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等体现共产主义道德的价值观已经过时，是“左”的东西，是“践踏人的本性”的。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撞击中，一些大学生再次陷入哲学与伦理道德的误区。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大会把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出现了全党全民重视教育的热潮，“知识热”、“人才热”、“文凭热”进一步升温，教育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高等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重要讲话，澄清了一个时期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大原则问题，使一度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收敛。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多年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产品经济模式，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相继出台，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

这一切，对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的震动尤为强烈，使他们淤积的消沉暗淡心态为之一扫，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振奋。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相继出现。许多大学生重新喊出了“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心声。大批大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社会实践，开展各种社会服务，主动申请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清华大学化七（2）班的同学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充分体现时代责任感的口号，北京大学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历史性豪言壮语。1984年国庆节，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表达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片赤诚，对改革开放方针的热烈赞颂，对民族崛起的美好憧憬。

遗憾的是，我们在工作上没能抓住这样的极好机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宣传，进一步把青年学生的心态和思维引向中国历史的科学发展进程，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升华。相反，不少同志被大学生一时的热烈、激昂情绪所陶醉，看不到他们身上的弱点和造就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的人甚至把大学生吹捧为“天之骄子”，“时代的精英”，这就使不少大学生强化了盲目的优越感和“特

殊公民”的意识。他们把自己摆在一种不适当的位置上，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在改革曲折发展的旋涡中，自然难以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大约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这样一些情况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刚起步，新旧体制交替和激烈冲击的形势下，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同步发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潮象瘟疫一样蔓延，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交易的腐败现象严重侵蚀了党和整个社会的机体，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爬坡的关键时期。供需矛盾扩大，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和对改革中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承受能力低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社会不安定的情绪在增加。

高等教育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教育经费短缺，“人才热”急剧降温，脑体收入倒挂开始出现，这些都直接危及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在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各自改革的途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复杂的情况，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资本主义世界借机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渗透，出现了一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论”、“融合论”的反动思潮。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极少数人借机更加起劲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造成了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他们利用到大学讲演等机会煽动青年学生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怀疑情绪，为一些大学生的灰暗心理所导致的厌学风、经商风等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偶发情况

都可能成为大学生发泄消极、焦躁情绪的爆发点。1985年，日本右翼势力屡次制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翻案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9月18日，北京一些高校学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到天安门广场示威，高喊“打倒卖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极端口号。表面上看，这是爱国的行动。实质上，却迎合了与改革开放政策相抵触的狭隘民族情绪，也是大学生对现实不满、焦躁情绪的发泄。但是，这个“红灯”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党和政府的批评也并没有被大多数学生所真正接受。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界的中心话题。方励之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借机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诬蔑我们党“30多年没干多少好事情”，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超越历史”，是“彻头彻尾的幻想”，鼓吹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所有全部的东西”，煽动学生“要为民主而斗争”。由于他们头上戴着“权威”、“导师”、“名流”等桂冠，因而他们的反动宣传在大学生中就更有蛊惑力。一些学生把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以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思想上产生了种种混乱。1986年底，首先在中国科技大学再次发生学潮，并很快波及许多大城市。一些大学生喊着“反对物价乱涨”，“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反对官僚政治”等口号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学潮很快平息了，以党的总书记更迭和方励之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被清除出党而宣告结束。

1986年学潮再次证明一些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走向已经偏离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尽管邓小平同志在学潮前后发表了多次讲话，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性质、危害以及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反复告诫全党“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为什么学生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党和政府及高等学校也作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暂时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赵紫阳同志阳奉阴违，消极对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走过场，使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不久就偃旗息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跃人物在收敛了暂短时间后，依然故我，甚至更加有恃无恐。

1986年的学潮，部分大学生用自己的偏执言行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引来了社会的责难。一些报刊不约而同地批评了大学生思想上的弱点和问题。由于学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他们感到委屈，认为党和政府不理解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表示愤怒，发出了“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的哀怨，冲动的激情急剧地转化为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政治对人生价值的双重失落感。一些大学生失去了人生价值的支撑点，对现实和未来采取玩世不恭的消极态度，厌学情绪进一步滋长，在跳舞、打麻将、谈恋爱中寻求安慰和满足。

对大学生这种精神滑坡的严重状况，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往往只停留在责难上，从上到下并没能采取切实有力的解决措施。相反，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进一步泛滥，由于改革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暴露和激化，致使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日益恶化。

1987年以后，通货膨胀更加突出，物价以两位数的指数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情绪；由于赵紫阳同志主张“淡化党的领